
茅盾全集

第二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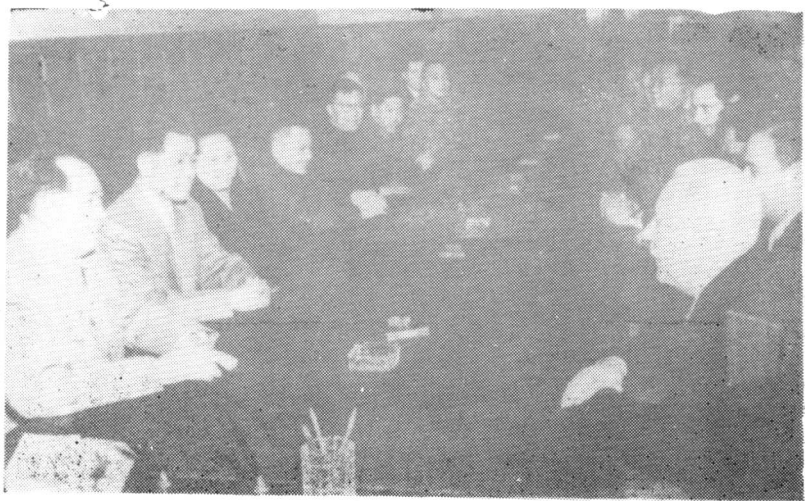
中国文论八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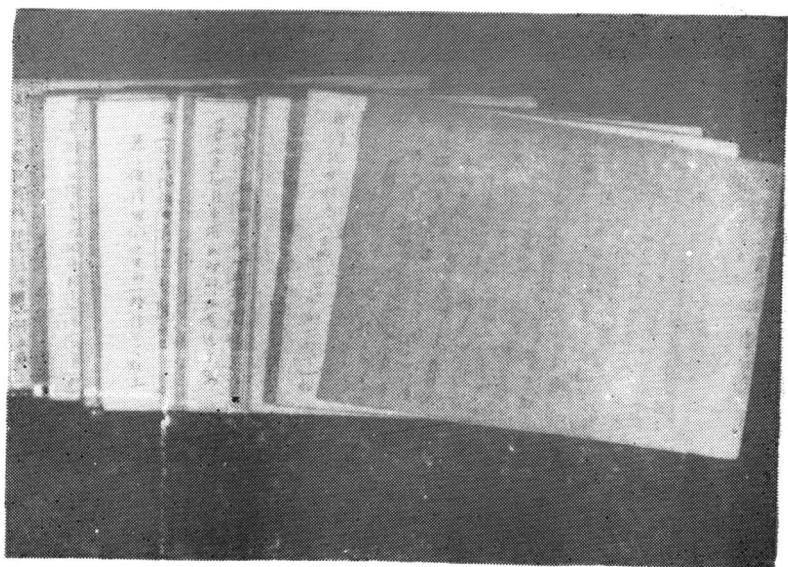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摄于北京寓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作者随同毛泽东主席为首的
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图为
中国代表团拜会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
宫“书市”上与读者见面



《夜读偶记》手稿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作者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九年间所作论文、短评、序跋以及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演讲、发言等共五十八篇。

其中大部分文章曾由作者分别编入《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鼓吹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一月出版）、《鼓吹续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十月出版）、《茅盾评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版）、《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出版）和《茅盾文艺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二月出版），其余均系首次编集。

篇目的排列基本上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所收作品均据各初版本和作者后来校订过的《茅盾论创作》、《茅盾评论文集》和《茅盾文艺评论集》以及最初发表的报刊与手稿作了校勘。

目 录

漫谈编辑工作	1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 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4
杂谈短篇小说	9
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13
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	16
——在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	25
关于创作规划及其它	31
——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规划座谈会上的结束语	
在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36
在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座谈会上的发言	41
中国画院成立祝辞	45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十五周年的发言	47
在作协整风会上的发言	49
“放”、“鸣”和“批判”	51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53

关于文化工作的几个问题	56
两个问题	71
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远景	75
从“眼高手低”说起	92
必须加强文艺工作中的共产党的领导!	97
关于写真实和独立思考	103
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	108
——驳右派的一些谬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永远胜利前进	117
答 JUGOPRES 提出的三个问题	120
夜读偶记	121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	
《夜读偶记》初版后记	229
《夜读偶记》的后记	230
关于所谓写真实	257
如何保证跃进——从订指标到生产成品?	264
工人诗歌百首读后感	267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	273
关于革命浪漫主义	289
——六月十日在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黑龙江省工农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294
试谈短篇小说	304
谈青年业余创作	310
——在沈阳市青年业余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文艺和劳动相结合	317
——在长春市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	330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在文化部部务会议的报告	
关于《党的女儿》	341
新形势与新任务	344
——九月二十七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开场白	
为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事业而斗争的中国文学	348
——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报告	
悼郑振铎副部长	358
《鼓吹集》后记	361
新年话家常	363
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	374
漫谈文学的民族形式	424
怎样评价《青春之歌》?	435
创作问题漫谈	446
——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潘虎》等三篇作品读后感	459
关于文学研究会	463
推荐好书还须好文章	467
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469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发言	482
坚决完成社会主义文化革命	492

《茅盾选集》序言	495
从已经获得的巨大成就上继续跃进!	497
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	501
悼靳以同志	514
从创作和才能的关系说起	517
文化战线上取得的胜利	530
——应《苏维埃俄罗斯报》之请而作	

漫谈编辑工作*

也许和教书有点相似，编辑工作有快乐，也有烦恼。一期的刊物编好了，自己看来也还不至于让读者花几毛钱而大呼上当，这时候就有“如释重负”的乐趣。这同教师们的“自问尚不至误人子弟”的心情，该是差不多的罢？至于在投稿中发现了天才，那就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样地其乐陶陶。

快乐是相似的，烦恼却就各不相同。

这篇小文不打算弄成“教师与编辑合论”，请允许我只谈谈编辑工作。

弄不到好稿子，编不成一期刊物，印刷所又催的紧，可是送来一堆投稿者的信，却又大骂编辑“有眼无珠”，“埋没了天才”，“崇拜权威”，“贵族老爷态度”：这一种啼笑两难的苦处，恐怕不是当过三年编辑的人不容易体会罢？这当儿，主观而又勇于自信的人，是有福了，他是大概能够“心安理得”的。这且存而不论。事情有比这更为“微妙”的，比方说，拿起稿子来，“笔则笔，削则削”，一方自认是负责帮助，而另一方却并不欢迎，认为是“强奸”了他的作品。像这种事，原则上双方都有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文艺月报》一月号，署名玄珠。曾收入《茅盾文艺评论集》。

理，但如果按之具体事实，则就不那么简单。别人将怎样说，我不便乱猜，如果碰在我自己身上，我的反应很单纯：改得好的，我自然感激，即使只是一个伪字的订正，我也愿奉为“一字师”；不过，如果要把“蔡中郎”^①改为“蔡郎中”，“披头散发”改为“披散头发”，那我只好说不敢领教；又或者，拿起汉文法规范化的尺度，非要把“我哥哥的帽子”改为“我的哥哥的帽子”不可，非要把“我这儿子，真叫人又好气又好笑”，改成“我的儿子的行为，真叫我又好气又好笑”不可，那我也只好说不敢苟同。

动机好，结果不一定都好；上面所举的事例，我的看法是：负责可感，勇敢可敬，然而不讨好，无非吃了“不学无术”四个字的亏！

正因为供求不相应，编辑一般的业务水平苦于不太高，我想，我们只好“保守”一点，来一个中庸之道：编辑工作要有“教育作用”，但也要谨防“好为人师，误人子弟”。直直落落说，就是：负责是好的，但不要太主观、太自信；笔削之前，多想想，多查查书，总不会有坏处。而在决定要修改时，应当先征求原作者的同意。

我以为编辑工作也可以试试来个“百家争鸣”。

如何争鸣呢？我的想法，说出来贻笑大方，不过是这样的：

编辑部把它认为基本上好然而经它一改以后就更加完美

①“蔡中郎”即蔡邕（132—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曾官为左中郎将，故名“蔡中郎”。著有《蔡中郎集》。

的作品连原稿带改本一齐登出来付之公评（自然，如果是短稿，可以全登，如果是长稿，可登改得最多的一部分）。

这样做，还有下列的一些好处：用举例的方法，满足了很多青年投稿者，或者不一定是青年的业余投稿者期望编辑部详细地具体地提意见的要求；满足了很多有志于写作的青年们期望编辑部兼任函授学校的要求；用真凭实据来证明编辑部绝非崇拜权威、贵族老爷态度，而是经常淘沙里之金，孥沧海之遗珠的；最后，借此也可以证明编辑部的削改对于作者有帮助、有教育意义。

有人也许又要问：如果原作者不同意这样来对比，则将如何？自然，首先要取得原作者的同意。

有人也许又要问：如果第三者希望就这改本再修改，或者不同意那改本，则又将如何呢？

我想，编辑部不会不欢迎这样的争鸣。而且我相信，任何编辑部都有“择善而从”的雅量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大约八个月前，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八个月的时间，对于这一种继往开来、规模远大、取精用宏、生气勃勃的学术、文艺活动说来，实在还是太短，不应该要求它已经会获得茂盛灿烂的果实。然而，尽管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不但已经出现了万象竞新的局面，而且也已经有了值得称道的第一批收获。有害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克服。

自然，事情不会像有些人所想象那样轻而易举、通顺无阻。“放”和“鸣”还未见大畅，而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右倾思想也出现了。这就是不加分析地抹煞过去的成就，这就是懈怠乃至厌恶马列主义的学习，这就是强调了文艺的特殊性，并在文艺特殊性的借口下削弱文艺的思想性，乃至怀疑工农兵方向、怀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思想指导作用。

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为恋爱而写恋爱”的、乃至色情气味相当浓重的作品，也出现了顾影自怜、欣赏“身边琐事”、几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曾收入《鼓吹集》和《茅盾文艺评论集》。

乎没有任何思想性的作品。

也出现过这样的怪论：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之根源，在于工农兵方向云云。

这些错误的思想，我们所不喜欢的“莠草”，以及有害的“毒草”，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既是客观的存在，它的思想意识一定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我们不应视而不见，亦不必惊惶失措。我们的文艺活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向前发展着的。

但是，右倾思想既已或多或少地见于文艺各部门，自然要引起普遍注意乃至忧虑。抱着忧虑甚至惊惶心情的人们恐怕不少。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是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的。我衷心地赞扬他们的保卫工农兵方向、保卫社会主义文化、向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思想斗争的耿耿赤忱。可是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及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没有把艺术事业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因素和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因素两者力量的对比，作出正确的估计。他们看到去年六月以来的“百花”中放出了“莠草”或“毒草”，“百家”中鸣出了怪论、糊涂论，就不加分析的说，“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文章中提到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题材方面的“家务事、儿女情”，如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如戏剧传统剧目的挖掘与整理的问题，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等等。但是令人遗憾，四位同志的文章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全面分析这些问题的内容，而轻易地否定了和他们意见不同的议论。这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样的批评方法不能不说是教条主义的。他们认为今天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意见是“怀疑论、取消论，是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这一论断，也是使人难以同意的。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应当鼓励和帮助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投入斗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思想改造得更好。

现在又有这样的议论：生活经验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本钱，而写真实，则是作品的灵魂。看来这话并不错。可是，这样的议论的背后却还有一个“理论”，即是认为学习马列主义

是无关重要的，认为作家的思想改造是不需要的。换言之，亦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作家所必要的。这样的所谓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作家当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候，脑子里实在另有一种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乃至掺杂着封建思想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当他观照生活、艺术实践的时候，这原来有的世界观就在起指导作用。这是很危险的！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我们从事创作的人所必须获得的。我希望人人都有这法宝。但是我们也要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在作家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和生活实践，再加上集体的细致而耐心的帮助，就不能做好。如果我们今天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都应当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后写作，那就是不切实际，要求过高。并且一个作家如果（即使出于至诚）先来估量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够不够马克思主义水平，然后下笔写作，那他如果不是自信自欺，就会踌躇彷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一种专业，不是读完了若干册书，能够说一套，就算毕了业的。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够算是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对社会现实看的远，看的深，抓住关键问题，把握到社会发展的本质。而他的是否具有这个本领，也只有从他的作品来衡量。因此，作家的自己努力的方法，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体验生活、参加斗争，不断地写作。帮助作家的方法，是对他的作品进行科学的批评。另一方面，一个批评家是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有从他的批评文章来衡量。批评家自己努力的方法，除了学习和写作，也应